

哲學與文化

Monthly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 412

第卅五卷第九期

09.2008

專題／曾春海、朱漢民 主編

書院人文理念的當代意義專題

中國書院的精神及當代意義

仕學書院：明代在職官員的進修之所

書院祭祀中的道統意義

書院學術研究條件的分析及現代啓示——以南宋書院為例

對馬一浮復性書院儒學經典教育之省思

論儒、道、釋「經典」中的「人文關懷」

論清代台灣書院學規的精神及其對現代教育的啓示

朱熹、陸象山的書院理念及其現代意義



發行人：黎建球

社長：潘小慧

編輯委員（按姓氏筆劃序）

尤煌傑

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

朱建民

東吳大學哲學系客座教授

李震

教廷宗座聖多瑪斯
哲學院院士

沈清松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
中國思想與文化講座教授

孫效智

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陳福濱

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

張振東

多瑪斯總修院
哲學部主任

鄒昆如

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

楊世雄

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

劉千美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
東亞系教授

潘小慧

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

黎建球

輔仁大學校長
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

錢志純

前花蓮教區主教

ELDERS, LEO

Academician, the Pontifical Academy
St. Thomas Aquinas, Holland

MCLEAN, GEORGE F.

Emeritus,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Washington, D. C, U.S.A.

PALMER, RICHARD

MacMurray College, U.S.A.

SWEET, WILLIAM

Vice President (Academic), and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St. Thomas University, Canada

主編

尤煌傑

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

執行編輯

范家榮

陳俊宇

施玫芳

黃琦珍

編輯助理

張琮琳

徐

哲學與文化（月刊）

革新號第 412 期（第卅五卷第九期）

UNIVERSITAS

Monthly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

2008 年 9 月出版 印製日期 2008 年 8 月一刷 1000 冊

編輯：哲學與文化月刊編輯委員會

本期輪值編輯委員：陳福濱、潘小慧

專題主編：曾春海、朱漢民

出版者：哲學與文化月刊雜誌社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局版臺字第 0258 號

社址：106 台北市大安區樂利路 94 號

編輯部：24205 台北縣新莊市中正路 510 號

輔仁大學文華樓 412 室（通信請寄編輯部）

網址：<http://edit.umrpc.edu.tw>

電子信箱：umrpc@mail.fju.edu.tw

電話：02-29052263 傳真：02-29088628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局版臺字第 0598 號

地址：106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339 號

電話：02-27055066（代表號）

傳真：02-27066100

網址：<http://www.wunan.com.tw>

電子信箱：wunan@wunan.com.tw

郵政劃撥帳號：01068953 戶名：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戶名：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定價：零售每期新臺幣 200 元整

台灣地區長期訂閱：請郵政劃撥：01068953

戶名：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台灣地區訂戶：全年 12 期 新台幣 2000 元整

海外地區訂戶請寄銀行匯票向本刊編輯部訂閱。

港澳地區：港幣 720 元整／年（含郵資）；美加地區：美金 100 元整／年（含郵資）。

注意事項：

1.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內容轉載請註明刊期頁次。

2. 發行一個月內，未接獲刊物，請電洽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逾期三個月恕不予補寄。

Publisher: Li, Bernard

Director: Pan, Hsiao Huei

Editorial Board:

Chang, Aloysius (Dean of Philosophy Dept, the Catholic Taiwan Regional Seminary, Taiwan)

Chen, Fu Bing (Professor, Dept. of Philosoph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aiwan)

Elders, Leo (Academician, The Pontifical Academy of St. Thomas Aquinas, Netherlands)

Jue, Jien Ming (Visiting Professor, Dept. of Philosophy,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Li, Bernard (Professor, President,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aiwan)

Liu, Johanna (Professor, Dept.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Toronto, Canada)

Ly, Gabriel (Academician, The Pontifical Academy of St. Thomas Aquinas)

McLean, George F. (Emeritus Professor,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Washington, D. C, U.S.A.)

Palmer, Richard (Emeritus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MacMurray College, U.S.A.)

Pan, Hsiao Huei (Professor, Chairperson, Dept. of Philosoph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aiwan)

Shen, Vincent (Lee Chair in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University of Toronto, Canada)

Sun, Johannes (Professor, Dept. of Philosoph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

Sweet, William (Vice President(Academic), and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St. Thomas University, Canada)

Tsien, Andrew (Former Bishop, Catholic Hualien Diocese)

Woo, Peter Kun Yu (Professor, Dept. of Philosoph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aiwan)

Yang, Shih Hsung (Professor, Dept. of Philosoph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Yu, Huang Chieh (Professor, Dept. of Philosoph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aiwan)

Editor in Chief:

Yu, Huang Chieh (Professor, Dept. of Philosoph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aiwan)

Executive Editors:

Chen, Chun Yu

Fan, Jia Rung

Huang, Chi Chen

Shih, Mei Fang

Editing Assistants:

Chang, Tsung Lin

Hsu, Tzu Yu

UNIVERSITAS

Monthly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

No. 412 (Vol.35 no.9)

Sep. 2008 1000 copies per print

Editors: The Editorial Board of UNIVERSITAS

Editorial Committeemen on duty:

Chen, Fu Bing, Pan, Hsiao Huei

Theme Editor in Chief:

Tseng, Chun Hai, Zhu, Hanmin.

Publisher: UNIVERSITAS

Register No. 0258

Address: 106 No. 96 Le-li Rd. Da-an District, Taipei City, Taiwan, R.O.C.

Department of Edition:

242 Room 412, Wen Hua Lo,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510 Chung Cheng Road, Hsin-Chuang, Taipei Hsien, Taiwan, R.O.C. [Mail Address]

Web Page: <http://edit.umrpc.edu.tw>

E-mail Address: umrpc@mail.fju.edu.tw

Tel: 886-2-29052263

Fax: 886-2-29088628

Subscription in Taiwan:

postal transfer: 01068953

Name: Wu-Nan Book Inc.

Price:

NT\$ 200

Annual Subscription in Taiwan:

NT\$ 2000 for 12 issues

For overseas subscription, please send the bill of exchange to the Department of Edition.

Hong Kong and Macau: HK\$ 720 /year (postage included)

USA and Canada: US\$ 100/year(postage included)

Cautions:

1. All rights reserved. Any kinds of reproduction have to be acknowledged.

2. If the copy is not received within a month after the release, please contact Wu-Nan Book Inc. (domestic) or the departement of edition (overseas). But the copy won't be resent if it's overdue for three months.

目次

書院人文理念的當代意義專題

- 1 導言：書院人文理念的當代意義專題 曾春海
- 3 中國書院的精神及當代意義 朱漢民
- 19 仕學書院：明代在職官員的進修之所 鄧洪波
- 31 書院祭祀中的道統意義 肖永明
- 49 書院學術研究條件的分析及現代啓示——以南宋書院爲例 李兵
- 65 對馬一浮復性書院儒學經典教育之省思 李新霖
- 87 論儒、道、釋「經典」中的「人文關懷」 陳立驤
- 107 論清代台灣書院學規的精神及其對現代教育的啓示 劉振維
- 129 朱熹、陸象山的書院理念及其現代意義 曾春海

專題書評

- 151 書評：陳復：《心靈的學校：書院精神與中華文化》 戴立仁

青年哲學

- 157 論《莊子》書中有關「身體障礙者」之論述 高君和

學界訊息

- 174 戴立仁 編
- 178 會議報導 蕭振聲

附錄

- 186 編後語

本刊訊息索引：18 稿約 30 48 中英文注釋格式 64 進行中的專題 128 156 中英文參考文獻格式 187 下期預告

導言：書院人文理念的當代意義專題

曾春海

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教授

書院顧名思義是寫書、藏書、講學、師生之間承傳歷史文化之內容及其精神傳統的地方。中國的書院興起於唐代，盛行於宋代，迄今海峽兩岸都有書院的存在。書院不但是中國教育史上特有的機構，縱使從世界教育發展史的高度來看，仍是獨樹一幟的。書院是結合研究教學及人格養成的文教場所，其中涉及教育理念（理想和觀念）、辦學措施、讀書指導法、教學原理及方法，是我們至今仍可汲取其啟發性意義的思想泉源。在中國歷史上，很多著名的書院，常是蘊釀成一思潮構成一學派的學術教育基地。宋明時期盛行的「講會」制度，成為學術自由，百家爭鳴的精神溫床，促進了學術、教育、文化的發展，士風的提升。宋代官學與私學性質的書院並存，官學的優點在制度化，對書院教育的目標、內容、經費、成績考核等規劃具體而完備。但是，官學的缺點在於政治的干預，且易淪為師生的利祿之途。私學性質的書院則具有學術自由，尊師重道，師生共學同修，情誼高隆等優點，相對於官學，則顯出其欠缺制度性規劃的不足處。值得注意的是民間性的書院之產生，常源發於對科舉考試及其導向的教育不滿，當他們試圖努力改革教育而成效不彰時，這就是為追求崇高的教育理想而誕生民間性書院的主要成因了。

宋元明清以來，民間性質的書院不但是產生儒學學派的基地，也是凝聚和鼓動時代學術思潮的重要平台。梁啟超在其《清代學術概論》一書的首頁上即指出：「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則其思必有相當之價值，而又適合乎其時代之要求者也。凡時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時代必文化昂進之時代也。」他還進一步解釋了思潮所以形成的動力在於「環境之變遷，或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進路，同趨於一方向，于是相與呼應洶湧，如潮然。」因此，書院對不同時代的精神需求和精神文化的創新有其不可忽視的動力因，書院不只侷限在既有歷史文化傳統的承傳功能而已。例如，宋明儒學的氣學、理學、心學分別與張載、王夫之；程伊川、朱熹；陸象山、王陽明的書院講學有不可脫離的關係。

本期專題係以中國傳統書院為的教育理想和觀念及其對當前海峽高校或大學教育之不足處所具有的啟發性意義為主，嶽麓書院是中國最古老於今又最具活力的書院。在書院精神文化的承傳和對中國書院所進行的客觀研究上，無疑地，該書院實

具有指標性意義，本人與該書院的現任山長（相當於書院院長）朱漢民先生相識甚久。因此，本人特別將本期專題論文所計畫的八篇中，提出四篇的篇幅敦請朱漢民先生代為邀稿，配合台灣學者所撰寫的四篇專文，共同構作出本期論文的質量，也兼具海峽兩岸學界為承傳傳統文化進行相互交流及共同努力的意義。

茲簡介海峽兩岸兩方撰文作者的論題如下，敦請讀者們細心品讀其間多樣而豐富的寶貴高見，或能深化我們對書院及當前教育的深思，進而激發對當前人文教育的憂患意識，共同關心、探索這一課題。大陸撰文的四位學者分別是：朱漢民教授的〈中國書院的精神及當代意義〉、鄧洪波教授的〈仕學書院：明代在職官員的進修之所〉、肖永明教授的〈書院祭祀中的道統意識〉、李兵教授的〈書院學術研究條件的分析及現代啓示——以南宋書院為例〉。台灣撰文的四位學者，除本人所撰寫的〈朱熹、陸象山的書院教育理念及其現代意義〉外，另有三位目前專門從事大學通識教育的學者，分別是曾任國立台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的李新霖所撰寫之〈對馬一浮復性書院儒學經典教育之省思〉、台灣中部地區，私立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劉振維副教授的〈論清代台灣書院學規的精神及其對現代教育的啓示〉以及台灣南部地區，私立高苑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兼主任的陳立驤博士的〈論儒、道、釋「經典」中的「人文關懷」〉。這八篇論文各有關注的主題及不同的撰文風格和價值所在。此外，還有唯一的一篇書評是由台灣輔仁大學哲學系博士候選人戴立仁所撰寫的〈書評：陳復：《心靈的學校：書院精神與中華文化》〉，這些作者們對本期投注了心力和貢獻，在此衷心銘謝，尚祈讀者們能不吝賜教為盼。

中國書院的精神及當代意義

朱漢民

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教授

內容摘要：中國近代高等教育體制的建立是模仿西方大學制度的結果，而並沒有積極承傳、有效吸收中國傳統教育的精髓。本文認為，延續千年辦學的書院是中國古代的大學，這是一種以成年人為培養對象、通過研究和傳播高深學問而培養高級人才為目的的教育機構。千年辦學所積澱的書院精神則集中體現出中國傳統教育的精華，具體體現在為求道的人文精神、學術創新精神、社會教化精神。通過積極承傳、有效吸收書院精神，能夠促進具有人文精神的中國現代大學文化的建設。

關鍵詞：書院精神、大學文化、傳統教育

壹、引言

書院改制與近代高等教育體制的建立是 20 世紀初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史上的兩件大事。然而，這二者之間並未建立真正的前後關聯性，1901 年書院被視為歷史的垃圾而拋棄，正如傅斯年先生所言：「清末改革教育，凡舊制皆去之，於是書院一齊關門，而書院之基金及地皮多為劣紳用一花樣吞沒了」¹。正因為如此，在必須變革中國傳統教育的背景下，近代中國大學的建立就不可能以書院改制為基礎，而模仿西方已經相當成熟的大學制度便成為當時必然的、可行的選擇，蔡元培先生云：「晚清時期，東方出現了急劇的變化。為維護其社會生存，不得不對教育進行變革。當時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要仿效歐洲的形式，建立自己的大學。」²這種建立近現代高等教育體制的選擇，使得中國傳統高等教育與近現代大學之間就出現明顯的斷

¹ 傅斯年：《改革高等教育中幾個問題》，載《獨立評論》第十四號。轉引自楊東平主編：《大學精神》，上海：文彙出版社，2003，頁 21。

² 蔡元培：《中國現代大學觀念及教育趨向》，轉引自楊東平主編：《大學精神》，上海：文彙出版社，2003，頁 5。

裂，書院在千餘年發展歷程中所積澱的文化精華，並未成為中國大學文化的組成部分。在建設 21 世紀中國大學文化的過程中，充分挖掘書院精華，將其轉換為大學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應是構建 21 世紀有中國特色大學文化的必經之途。

貳、作為中國古代大學的書院

書院是唐末五代出現的一種獨特的教育組織形式，它是在系統綜合和改造傳統官學和私學的基礎上所構建的一種不是官學但有官學成分，不是私學但又吸收了私學長處的全新的教育組織形式。對於書院教育的層次問題，書院研究者表現出明顯的分歧³。

在中國古代書院發展史上，書院是有層級差異的，既有作為蒙學層次的家族書院、鄉村書院，又有作為高等教育機構存在的高層次書院。在中國古代的教育體制中，教學內容實際上只存在著蒙學和高等教育的差異，並沒有一個中學教育的中間層次。因為讀書人通過啓蒙教育之後，其學習內容便是科舉考試所規定的知識，其難易程度上並無明顯的差異。因而，古代教育體制實際上只存在小學和大學兩種類型的學校。顯而易見，實施高等教育的機構則是大學，高等教育層次的書院是中國古代大學的重要形式之一。

大學是以成年人為培養物件，通過教授高深學問，創新和傳承文化，培養高級專門人才的機構。根據大學的這個界定，結合書院的相關文獻和前賢的研究成果，筆者對書院是中國古代大學的論斷進一步加以闡述。

首先，書院以成年人為主要培養對象。儘管從現有史料看，絕大多數的書院都沒有規定生徒入學的年齡。但我們還是可以從一些相關的史料中窺見書院生徒的年齡。如著名漢學家錢大昕在蘇州紫陽書院肄業時已經 22 歲，兩年之後便成為了舉人，乾隆十九年（1754 年）又登乾隆甲戌科進士。⁴另一位漢學家王鳴盛 23 歲時即

³ 有的學者認為書院是大學，「書院從總體上講是古代的大學，實施的是有別於啓蒙教育的更高層次的教育」（李才棟：《中國書院研究》，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頁 284）。有的學者則認為書院是多層次的，既有「大學一級，也有小學一級，不能只講大學而不講小學」（鄧洪波：〈中國書院非大學說〉，《教育評論》，2002 年第 6 期，頁 79）。而有的學者則從大學自治的視角出發，「可以肯定地說：在中國的傳統中既沒有自治權之說，也不存在學術自由的思想。」「因此沒有可以稱得上大學的高等學府」（許美德：《中國大學：1985-1995 一個文化衝突的世紀》，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9）。

⁴ 〈錢辛楣先生年譜〉，轉引錢大昕：《嘉定錢大昕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頁 12。

乾隆九年（1744 年）進入蘇州紫陽書院，乾隆十二年（1747 年）考中舉人，乾隆十九年（1754 年）被取為榜眼。⁵在嶽麓書院的著名生徒中，賀長齡 22 歲、中國第一位駐外使臣的郭嵩燾 18 歲、左宗棠 20 歲左右、魏源 19 歲進入書院學習。對於書院生徒的年齡，我們還可以從元代程端禮所制訂的、並廣泛應用於書院教學的《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來推斷生徒的年齡，他將讀書分為「八歲未入學之前」、「自八歲入學之後」和「自十五志學之年」三個階段，認為提出生徒自十五歲開始，需要用三、四年的時間來潛心學習，以掌握真正的「為己之實學」，之後才能準備參加科舉考試。因此可以推斷，屬於古代大學的書院所招收的生徒至少應在 15 歲以後，或者稍大一點。由此可見，書院生徒的年齡與現在大學學生的年齡相差無幾。

其次，書院實施培養高級人才的教育。在傳統中國的教育體制中，除醫學、天文、書法、算學、律學等專門的職業教育之外，幾乎全部的高等教育機構都是教授儒家經典和通識方面的知識，主要是培養能充任職業文官的人才，這是一種典型的文官專業教育。當然，書院也不例外，在千餘年的發展歷程中，書院承擔起了培養高級專門人才——從事儒學研究的人才和政事人才的重任。

唐末五代是書院的萌芽時期，書院的產生和發展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書院補官學之不足，滿足生徒獲得知識需要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唐代中後期開始，儒學及充任文官的士人紛紛選擇隱居山林讀書這種求學方式，在隱居讀書的山林中逐漸衍生出一種新的教育組織形式——書院或者書堂。可見，書院的產生就是作為人才培養機構的形式出現的。

作為教育組織形式的書院在宋代得到長足發展，是書院發展的鼎盛時期。北宋建立之初，在朝廷無法提供足夠的求學之所的背景下，書院則受到朝廷和士人的青睞，成為官學的替代機構，承擔起了教學的重任。南宋建立之後，書院再次承擔起了培養人才的重任，書院的教學內容和科舉考試內容逐漸趨向一致，書院成為教育機構的內在發展邏輯更加符合社會的需要。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之後，為緩解教育資源緊張的狀況，將書院納入官方的管理範疇，書院與官學一起承擔人才培養的重任也就是必然的選擇了。

明清時期，書院作為人才培養機構的作用更加突出。由於官學的機構特質以及經費不足等方面的限制，官學無法承擔起培養人才的重任。在這種情勢下，各級地方官吏、鄉紳和士人將人才培養的希望寄託在書院之上，數千所書院成為培養人才的主要機構。因此，我們認為書院是為傳統中國培養研究儒學和從政專門人才的大

⁵ 黃文相：〈清王西莊先生鳴盛年譜〉，載王雲五主編：《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12 輯。

學⁶。

再次，研究和傳播高深學問是書院的主要功能之一。高深學問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不同時代對高深學問的界定都不相同。以闡釋人的存在意義、價值取向為核心的儒家哲學是古代中國的高深學問，這是毋庸置疑的。而高深學問是與大學直接關聯的概念，「每一個較大規模的現代社會，無論它的政治、經濟或宗教制度是什麼類型的，都需要建立一個機構來傳遞深奧的知識，分析、批判現存的知識，並探索新的學問領域。換言之，凡是需要人們進行理智分析、鑒別、闡述或關注的地方，那裏就會有大學。」⁷這樣，古代中國肯定有創新與傳播以儒學為核心的高深學問的大學，書院則是古代中國大學的代表。

北宋中後期，以二程為代表的新儒學家因為無法利用官方的機構研究和傳播其學說，於是民間色彩濃厚、具有相對獨立性的書院成為他們的首要選擇。新儒學和書院的結合不僅使新儒學獲得發展的依託，而且也使書院獲得了新的發展空間，書院因之轉型為新儒學的研究和傳播基地。南宋時期，為謀求自身的發展空間，以朱熹、陸九淵、張栻、呂祖謙等為代表的新儒家再次選擇書院作為研究基地。程朱新儒學不僅建立了完整的學術體系，而且還將學術研究與教學結合起來，在造就了大批研究、傳播新儒學人才的同時，也培養了大批通過科學考試入仕的生徒。

與人才培養功能相較，元代書院的學術傳薪功能並未得到充分發揮，這一時期的書院主要承擔了傳播儒學的任務。明代中後期，以王陽明、湛若水為代表而創建的心學，以直截了當的表達方式獲得了士人的認同，書院再次成為王湛之學的倡導者和信奉者研究和傳播學術的場所。這些講求心學的書院重視講學，通過建立講會制度開展會講，使書院的學術創新功能得到了更加充分的發揮。

清代書院的學術功能並未因書院科學人才培養功能的強化而被削弱。乾嘉漢學產生、發展都與書院有著不可割捨的聯繫，出現了專門研究漢學和培養漢學人才的書院，如阮元創立的詁經精舍、學海堂等。乾嘉漢學的領袖人物和中堅學者或肄業、或執掌、或任教於書院，書院成為漢學研究、人才培養場所。創新和傳播高深學問是書院作為中國古代大學的最典型標誌之一。

在千餘年的發展歷程中，作為中國古代大學的書院不斷調適自身的發展邏輯，通過培養高級專門人才、創新和傳播高深學問，以滿足社會的需求和適應中國傳統政治和社會環境，正是在這種調適與發展中產生了具有典型中國特色的書院文化精神。

⁶ 參閱李兵：《書院教育與科學關係研究》，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第5章。

⁷ 布魯貝克：《高等教育哲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頁13。

參、書院精神的基本內涵

書院精神是在書院的發展歷程中形成的，經過千餘年的傳承與創新，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價值取向、思維方式和行為規範的精神。書院精神的內涵相當豐富，筆者試圖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進行解讀。

一、以道為核心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指一種注重人格的發展與完善，強調人的價值和需要，關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義，並且在現實生活中努力實踐這種價值、需要和意義的精神。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部分，而儒家文化對士人的人格要求、價值體現和實踐這種價值的方式方法，都體現為對「道」即儒家的道德理想追求上來。而儒家對於「道」的追求是分為兩個相互關聯的層面：士人通過改造自身、完善自身人格，實現所謂「修身」。在此基礎上，儒家強調士人應該將「道」轉化為和諧社會秩序，最終實現「天下大同」的理想，即所謂的「齊家、治國、平天下」。

儒家將這種人文精神滲透到教育的各個層面，使中國傳統教育呈現出典型的人文特色。如前所述，書院是唐宋以來教育的主要承擔者，也是以「道」為核心的人文精神的主要踐履者。書院將道德教育擺在教育活動的首要位置，並按照儒家的道德理想模式來設計書院的人才培養模式。長期主講南宋長沙嶽麓書院、城南書院的著名學者張栻認為書院應該「傳道而濟斯民」⁸，將儒家的「道」作為教學的主要內容和追求目標。王陽明的為學理路雖然與程朱理學明顯不同，但在書院的人才培養模式選擇上，則顯得高度一致，他認為書院教育在於「明人倫」⁹。所謂「明倫」就是要精通儒家的倫理道德，並將其內化為信念，進而外化為行為準則。

書院將道德教育滲透到教育教學活動的每一個環節，並將其制度化為章程、學規等的形式，使書院重視道德教育的人文精神充分顯現出來。朱熹在白鹿洞書院制定的《白鹿書院揭示》中，對書院生徒的道德教育有非常明確的規定，「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¹⁰南宋以後，大多數書院都將遵循這一學規，

⁸ 張栻：《南軒文集》卷十，《潭州重建嶽麓書院記》。

⁹ 王陽明：〈增修萬松書院記〉，《王陽明全集》卷七，〈文錄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253。

¹⁰ 朱熹：〈白鹿書院揭示〉，《朱熹集》卷七十四，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頁3894。

只是在不同的時候和不同的書院根據實際情況補充一些大同小異的條目而已。清代嶽麓書院山長王文清於乾隆十三年（1748 年）制定《嶽麓書院學規》，其內容的前半部分就對道德教育進行了詳細的規定：

時常省問父母，朔望恭謁聖賢；氣習各矯偏處，舉止整齊嚴肅；服食宜從儉素，外事毫不可幹，行坐必依齒序；痛戒訐短毀長，損友必須拒絕；不可閒談廢時。

在這份學規中，將儒家的孝、忠、莊、儉、和、悌、義等道德規範作為生徒的行為準則，這是嶽麓書院強化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很顯然，重視道德教育是實現個體道德完善的最具體手段，也是書院人文精神彰顯的一個維度。

書院人文精神另一個展開的維度則是培養生徒實現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書院學者認為儒家對「道」的追求不止是個體的完善，也不僅僅是在超世脫俗中得到滿足，而是應該在個體道德完善的基礎上，實現全社會的完善。因此，書院學者們往往將這種人文追求與社會政治、日用人倫結合在一起。而在傳統中國的政治體制下，科舉是幾乎將儒家經典知識權力化的唯一制度，也是士人將文化話語權轉化為政治話語權的必經之途，書院與社會政治的結合往往表現為對科舉仕進的追求。因而，為實現個體道德完善與「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大多數書院都將道德教育與應試教育統一起來，目的在於培養「德業」與「舉業」並重的人才。書院大師們認為士人必須在研習儒家經典的基礎上，將儒家思想內化為良好的道德修養和崇高的品格，而不是片面追求科舉之學，即所謂立志。朱熹說：「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為文以應之，得失利害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¹¹

為避免忽視個體道德完善而片面追求「舉業」的教育趨向，書院學者對片面的應試教育進行了嚴厲批評。如南宋湖湘學派的奠基人胡宏在《碧泉書院上梁文》中指出：在科舉取士的影響下，學界出現了「幹祿仕以盈庭，鬻詞章而塞路，斯文掃地，邪說滔天」的不幸狀況。¹²儘管如此，我們在解讀書院人文精神的時候，還是不能簡單認為書院的人文精神是反對科舉應試教育的。實際上，科舉應試也是書院學者人文精神的一個組成部分，只不過是科舉之學的最終目的必須與內聖外王之道緊密結合在一起而已。

此外，以「道」為內核的人文精神，還廣泛地體現在書院環境的選擇和建設上。

¹¹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長沙：嶽麓書社，1998，頁 219。

¹² 胡宏：《胡宏集》卷三，《碧泉書院上梁文》，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 201。

書院一般都選址於環境優美之地，如白鹿洞書院在江西廬山五老峰下、嶽麓書院在「嶽麓之勝甲於湘楚」的嶽麓山下、嵩陽書院在五嶽之一的嵩山腳下等等¹³。

除了重視外部環境的選擇，書院還注重內部環境的創設。書院建築的總體佈局是遵循儒家綱常倫理的，內部環境的佈置也時刻彰顯出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如嶽麓書院講堂佈置就十分具有代表性，講堂左右兩邊牆上嵌有朱熹手書的「忠、孝、廉、節」和清代山長歐陽正煥手書的「整、齊、嚴、肅」八個大字，集中體現了嶽麓書院的院風和道德教育傳統。嶽麓書院講堂的這種佈置使書院生徒置身於一種濃厚的儒家倫理道德氛圍之中，時刻警醒生徒保持對儒家倫理道德的體悟和追求。

書院的祭祀也體現出顯著的人文特徵。書院除了與官學同樣將孔子等先聖、先師、先賢作為祭祀物件之外，還要供奉本院學派的創始人或代表人物，以及與本院息息相關的人物。其目的在於一方面彰顯本院的學派學風和旨趣，另一方面意在將這些人樹立為本院生徒道德和學術的榜樣，通過潛移默化的方式開展人文教育。

書院不僅將以「道」為核心的人文精神提升到絕對主導的地位，並將其貫徹到書院的各個層面，使書院教育呈現出典型的人文特質。書院教育強調生徒道德的完善和治國、平天下的能力的統一，培養了不少德才兼備的人才，他們在各個歷史時期都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這充分表明書院所倡導的人文精神是有著旺盛生命力的。

二、學術創新精神

宋代以來，中國古代學術的發展經歷了多次發展，包括宋代的程朱新儒學、明代的王湛心學、清代的乾嘉漢學。這些學術學派的形成與發展都與書院息息相關，或者是以書院為研究基地，或者以書院為傳播基地，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書院的學術創新精神是以書院寬鬆的辦學環境為基礎，學術大師雲集書院講學為推動力，師生相互答疑問難、相互激盪獲得新的觀點、思想而形成的。

1. 相對寬鬆的學術環境。在具備一定物質條件的前提下，相對寬鬆的學術環境是決定學術創新與傳播的關鍵因素。書院的學術創新需要在兩個方面取得突破：一方面，書院學術創新需要超越固有的學術傳統和慣習的桎梏，如程朱新儒學通過重新闡釋儒家經典，打破漢唐經師對儒家經典解釋的壟斷地位。王湛新儒學則是試圖突破程朱新儒學的「支離」，提出了「心即理」、「致良知」的學術主張。乾嘉漢學是

¹³ 參閱朱漢民：《儒家人文教育的審思》，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頁130-131。

對程朱新儒學的反動，用漢代學者重考證的方式方法來研究儒家經典；另一方面，書院學術創新還必須突破統治者通過科舉制度、官學體系所實行的學術控制。而書院學術創新要能實現這兩個方面的突破，必須具備寬鬆的學術環境和靈活的體制。

如前所述，書院的性質不同於官學，它發端於私人藏書讀書之所，即作為私人辦學機構的形式出現的。雖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書院受到了官方的重視，甚至直接由官吏來創辦、管理和任命山長，大多數書院教學也以科舉為目標，使書院出現官學化。但與官學相較，書院從來沒有被朝廷的官方文件正式納入官學體系之中，即書院沒有被官方視為「儲才以應科目」的機構。正因為如此，書院受到的控制遠遠小於官學，書院在經費管理、山長選聘、教學內容與方式以及人才培養目標的確定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自主權，這是書院實現學術創新的重要條件。

不僅如此，書院與私學也有著顯著的不同：首先，書院有以學田為核心的經費體系的支撐，將學田出租的收益作為其日常的運作經費，並建立了相當完善的經費管理體制；其二，書院制定了相當完善的選聘山長、招收生徒、教學活動、藏書與祭祀等方面的制度。如清代書院選聘山長時，不少書院從學術水平、道德修養方面要求候選的山長，而且還規定山長必須能堅持長期住院開展教學活動。如有的書院將山長的薪水與其是否到崗工作聯繫起來，如果山長一月不到書院任教，就將這一個月的束脩和薪水支給代課者，以達到「重月課而收實效」¹⁴的目的。

書院與官學、私學的這些差異使得書院獲得了相對自主的學術傳薪環境和必要條件。如不少書院以充足的經費為支撐，購置和收藏了大量的圖書資料，甚至出版學術著作。如河南大梁書院是清代漢學在中原地區的重要基地，其藏書數量相當驚人，至清代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收藏有經、史、子、集、叢書、算學書、時務書等七類圖書，共計 2299 部，42151 卷。如果沒有足夠的經費支援，大梁書院是難以收藏如此巨大數量書籍的。除了收藏書籍，經費充裕的書院還自己刊刻本院教師的講義、生徒的優秀課藝、本院志等等。如以研究和傳播漢學而著名的杭州詒經精舍就將其生徒的課藝出版，先後出版了《詒經精舍文集》八集，成為清代漢學研究的重要成果。無論是書院教師的講義，還是生徒的課藝等既是對書院學術創新水平的反映，也是對書院創新的一種激勵措施。

由此可見，書院不但具有與官學類似的經費保障體制，有類似於私學的靈活辦學體制，而且還有官學、私學都不具備的相對自由的辦學空間和寬鬆的學術環境，使得書院師生不僅可以自由講學，而且能夠潛心創新學術，取得了程朱新儒學、明

¹⁴ 《墨池書院章程》，清刊本。

代王湛心學和乾嘉漢學、清代實學等重大創新成果。書院改制之後，胡適先生曾經就感慨過：「書院之廢，實在是吾中國一大不幸事。一千年來學者自動的研究精神，將不復現於今日」¹⁵。

2. 學術大師主講。學術學派的產生、發展及其影響力的大小不但取決於學術本身的價值大小，還取決於學術學派創始人、學術中堅及學術信奉者個人的影響力，學術大師對學術學派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如前所述，相對獨立的管理體制使書院不僅能聘請學術大師擔任書院的山長或主講，也可以延聘不同的學術大師前來講學，甚至會在書院形成相互答疑問難的學術討論盛況。

朱熹是南宋新儒學的集大成者，他創建、修復和支援多所書院發展，並積極講學於書院。朱熹一生創建寒泉精舍、雲穀書院、武夷精舍、同文書院和考亭書院等五所書院，還利用到各地為官的機會修復影響較大的書院，並講學其中。據統計，朱熹以在任官員的身份修復了3所書院。而在其講學的21所書院中，有8所是作為在任官吏的身份去講學的。此外，南宋學術大師張栻、陸九淵、呂祖謙，明代的心學大師王陽明、湛若水、清代的漢學大師惠棟、盧文弨、錢大昕、王鳴盛等人都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講學於書院。

這些學術大師將書院視為學術創新的基地，他們的重要學術研究成果不少是在書院完成的。朱熹的一生大部分是在書院度過的，其學術成果應該大多是在書院取得的。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農曆八月，朱熹攜弟子從福建到湖南嶽麓書院講學，與當時湖湘學派的代表人物張栻討論學問，他們討論問題主要集中中庸之義和「太極」這兩個宋代新儒家注意研究的問題上。這次講學對朱熹的學術體系建構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他自己多次指出：「去冬走湖湘，講論之益不少。」¹⁶

不少書院為提升學術創新水平，爭相延聘學術造詣高的大師擔任主講和山長。如漢學大師陳祖范深入研究儒家元典，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正是由於他在學術研究上有著作等身的成就，加之訓導有方，蘇州紫陽、徐州雲龍、安慶敬敷、揚州安定等書院都競相延聘他擔任山長。其他不少聲名顯赫的漢學家也在多所書院講學，以書院教學為終身職業者也不乏其人。吳派大師錢大昕晚年以書院教學為生，先後主講書院達23年之久，其中主講蘇州紫陽書院16年，並老死於書院之中。不僅地方大員爭聘學術造詣深邃的乾嘉學者執掌書院，有的私人創辦的書院亦聘請乾嘉學者擔任山長，江蘇洋川的毓文書院由商賈譚子文創建以後，即延聘漢學大師洪亮吉擔

¹⁵ 胡適：〈書院制史略〉，載《東方雜誌》第21卷3期，1924年2月。

¹⁶ 朱熹：〈答程允夫〉，《朱熹集》卷四十一，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頁1920-1921。

任山長3年¹⁷。

書院學術創新成果與教學活動相結合，不但為教學活動提供了豐富的資源，也極大地推動了學術創新，而且是學術學派形成的重要途徑。長期執掌江甯鍾山書院的著名漢學家盧文弨在書院教學過程中，通過讓生徒參與校勘工作來提高漢學研究水平，這樣不僅能加快學術研究的速度，而且能培養生徒的校勘水平。嚴元照說：「抱經先生嗜古好書，每觀罕見之本，輒課生徒分抄，抄竣，親以朱筆校勘，所抄之書，卷以百計。」¹⁸除了讓生徒直接參加學術研究活動，書院教學的重要方式答疑問難也是學術創新與教學結合的典範。朱熹在《白鹿書院揭示》中明確規定了「慎思」，這一方法在書院教學中得到了普遍採用，學術大師們的《語錄》、《文集》中有大量的書院師生答疑問難的記錄，這些記錄是書院大師學術成果的重要組成部分¹⁹。

3. 社會教化精神。在中國傳統政治體制中，社會教化是歷代文教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各級地方官吏任職時期的重要工作。然而，官方的社會教化途徑卻是相當有限的，私學等傳播途徑所能發揮的作用又相當微弱。書院的出現卻使得傳統中國的社會教化局面發生了顯著變化，書院成為以文化傳播與普及為核心的服務社會的重要機構。

首先，**書院實行開放式辦學。**如前所述，由於書院不屬於國家教育體制，其創立、修復和廢止的自主性相對較大，官吏、學者、鄉紳、商人或士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設立書院，延師授徒講學。正因為如此，在宋代以來的絕大多數時期，書院數量都是多於縣學、府學和州學的。清代新創建的書院達3757所，修復前代書院608所，兩項共計為4365所²⁰。書院不僅數量遠遠超過官學，而且還遍佈在全國各地的鄉村，成為傳播文化的重要基地。

書院不僅在創設方面有相當大的自由度，而且在傳授對象方面是極為開放的。書院招收生徒雖然有嚴格的名額限制，即由書院資助或者部分資助的生徒數量也是相當有限的，朱熹復興白鹿洞書院時，在給朝廷的奏摺中說：「始議即其故基，度為小屋二十餘間，教養生徒一二十人」²¹。朱熹重振嶽麓書院時，正式生徒的名額也只有四十名。

¹⁷ 呂培：〈洪北江先生年譜〉，載《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14輯。

¹⁸ 柳詒征：《盧抱經年譜》，（南京）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第一年刊，1928，頁48。

¹⁹ 參見李兵：《書院與科舉關係研究》，第七章，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²⁰ 白新良：《中國古代書院發展史》，天津大學出版社，1995，頁271。

²¹ 毛琦德：〈乞賜白鹿洞書院勅額〉，《白鹿洞書院志》卷2，轉引自《白鹿洞書院古志五種》，頁1058。

然而，招生名額並不能真實反映接受書院教育者的數量，書院還面向更加廣泛的社會群衆，實行開放式的辦學。一是書院打破了官學限制生徒異地入學的規定，可以自由擇師而從學，其生徒的來源較北宋時期更為廣泛。如朱熹創辦的武夷精舍建成以後招收的 70 名門人中，除 10 人里籍不詳之外，不屬於福建省籍貫的有 24 人，佔有明確籍貫記載的 60 人中的 40%。²²張栻主教嶽麓書院時，除 2 人里籍不詳之外，31 人中有 20 人來自湖南之外的地區²³；二是書院不限制院外的士人來書院聽講，凡是有志於學問者，都可以進入書院聽大師講學。關於這方面的記載甚多，如陸九淵講學於象山書院五年，四方士子訪問者過數千人。這正好反映了書院的辦學宗旨——向廣大士子開放，以滿足其「道問學」的需要，從而達到傳播和普及文化的目的。

其次，書院教化的方式。與書院通過日常教學活動教授生徒不同，書院的社會教化往往是通過自身的學術活動與服務社會的方式來實現的。書院交流學術的重要方式就是會講，明代將會講制度化，形成了比較完善的講會制度，並在各地出現了相當多講會，使之成為學術傳播與社會教化的重要途徑。王陽明去世之後，王門弟子為傳播其學術，成立了水西會、同善會、君山會等講會。為能達到傳播和普及文化的目的，講會幾乎直接對所有的社會成員開放，可以說是來者不拒。如虞山書院規定：「虞山會講，來者一不拒，凡我百姓，年齒高者與年少而知義理者，無分鄉約公正糧裏市井農夫，無分僧道遊人，無分本境他方，但願聽講，許先一日或本日早報名會簿」²⁴。社會的各階層都積極參加講會，不少講會的人數多達數百乃至上千人。對聽講者開放的程度越高，社會教化的效果就越好。

除闡揚所屬學派的學術觀點之外，書院講會的主要功能就在於進行社會教化，趙紹祖在《赤山會約跋》中明確指出，書院講會的目的就在於教化社會，即所謂「拳拳以善俗為心」²⁵。而由蕭雍所制訂的《赤山會約》的內容包括遵諭、營葬、睦族、節儉、正分、廣仁、積德、慎言、忍氣、崇寬、勸業、止訟、禁賭、舉行、黜邪、戒黨、置產、恤下、閑家、端本等方面，這些都是關於民間風習、改善社會風尚的規範。

此外，書院的藏書和刻書活動也是書院傳播和普及文化的重要方式。如書院藏書除為本院師生的教學、學術研究服務之外，不少書院的藏書向院外開放，具有公共圖書館性質。如湖南益陽箴言書院的《箴言書院規制》中規定：「凡院外之人願讀

²² 資料來源方彥壽：《朱熹書院門人考》，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頁 90-132。

²³ 資料來源《宋元學案》卷 71，〈嶽麓諸儒學案〉。

²⁴ 孫慎行等：《虞山書院志》卷 4，耿橘：《虞山書院會簿引》，明萬曆年間刊本。

²⁵ 趙紹祖：《赤山會約跋》，北京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